

第二卷
奇迹的世纪

[美] 唐纳德·F. 拉赫 著

第二册
文学艺术
姜智芹 译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美] 唐纳德·F. 拉赫 著

周 宁 总校译



人 民 出 版 社

第二卷 奇迹的世纪

[美] 唐纳德·F.拉赫 著

第二册 文学艺术

姜智芹 译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

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美] 唐纳德·F.拉赫 著

周宁 总校译

2008 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及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研究”资助成果
“十二五”期间（2011—2015 年）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献给我的学生

序

xv

写完《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的第二册和第三册，我们对 16 世纪的论述即告一段落。在过去十五年的研究和写作中，我既生活在 16 世纪那个“奇迹的世纪”里，也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断进行宇宙空间探索的非凡时代中，观察研究我们这个星际时代，从很多方面教会我如何更好地理解 16 世纪欧洲人对海外发现的种种反应。和其他人一样，我有很长时间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海外发现要经历那么久的时间才在欧洲的思想、艺术和体制中体现出来，因此，看到当今社会对星系探索的迟钝反应，同样是暗自称奇。今天的和平征服者去探索地球以外的无人宇宙空间，而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只是缓慢地，有时是不情愿地、不无疑虑地开始意识到，人们对宇宙空间的认知将发生根本变化，而且随着新知注入旧学，人们的知识结构将进行新的调整。现在，我一点也不奇怪 16 世纪的欧洲人为什么需要经历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认识到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海外航行的意义。

在美国人进行登月探索、观测拍摄火星图像的日子里，我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地球上的芝加哥附近进行我的研究工作。尽管我为了准备撰写前面的几册书，到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搜集资料，但第二卷的第二册和第三册却需要我根据已搜集的资料，在雷根斯坦（Regenstein）图书馆、纽贝里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 里潜心写作。与前几册不同, 这两册书不怎么涉及实地调研, 因此不需要我外出大量地查找档案, 搜集资料。现在, 我只需要在整理、分析已收集资料的基础上, 根据第一卷序言中的计划, 按部就班地完成我的写作任务。我撰写第二卷第二册和第三册的目标是集中分析亚洲对欧洲知识界、欧洲各国文学和学术研究的影响, 总结《奇迹的世纪》中亚洲的意义。

查询文献、登记卡片、寻找图书以及管理办公室, 这些工作日复一日, 繁琐枯燥, 我要感谢我的诸多研究生助手, 他们能够甚至经常愉快地包容我的乖张怪癖、突发奇想和坏情绪。圣若瑟修女会 (C. S. J.) 的米谢拉·策纳修女 (Sister Michaela Zahner) 在芝加哥大学的葡萄藤下辛苦工作, 直到累病才不得不告假离开。之后, 彼得·伯格 (Peter Berger) 和罗伯特·奥尼尔 (Robert O'Neill) 接任米谢拉·策纳修女, 在调查、整理欧洲大量的图书馆及其藏书目录 (第二章) 方面给予我极大帮助。与此同时, 萨拉·鲍伯罗夫·伯隆 (Sara Bobroff Bolon) 和我一起研究科学史特别是生物学资料, 她是这个领域里的专家。格洛里亚·吉布斯 (Gloria Gibbs)、凯思琳·韦尔曼 (Kathleen Wellman) 和林恩·奥什塔 (Lynne Oshita) 不论在收集材料阶段, 还是本书的出版及文献目录编制阶段, 都出力很多。西奥多·N. 弗斯 (Theodore N. Foss) 是我的得力助手, 三年来阅读整部书稿, 提出修改意见, 设计并制作插图, 他在本项目上的所思所想, 一点不少于我。弗斯、奥什塔和丹尼斯·勒·考克·加菲尔德 (Denise Le Cocq Garfield) 和我一起联系出版事宜, 并协助我编辑索引。我把这套书献给这些帮助过我的同仁, 献给我在此前序言中提到的给予我帮助的人, 献给我的学生, 希望他们能在这套书中看到自己的卓越贡献。

由于涉及的内容庞杂, 门类繁多, 和前几册书一样, 我在研究中得到我的同事, 特别是芝加哥大学同事的倾力合作和帮助。T. 本特利·邓肯 (T. Bentley Duncan) 阅读、筛选了关于葡萄牙文学的资料, 而且由于他的葡萄牙语比我好, 帮我把一些葡萄牙语诗歌翻译成英语。梵语学者和文学史家 J. A. B. 范·布伊特南 (J. A. B. van Buitenen) 在梵语故事和寓言的传播方面施以援手, 通读了有关印度和东方文学传统继承的部分 (第三章)。埃里克·科奇兰 (Eric Cochrane) 和帕奥罗·A. 谢奇 (Paolo A. Cherchi) 审读了意大利文学 (第六章),

使得书中对意大利文学的集中分析和总体论述避免了很多错误。图书和出版史专家霍华德·W. 温格 (Howard W. Winger) 通读了关于图书馆和图书馆藏书的部分 (第二章)。西班牙文学专业的学子乔治·海利 (George Haley) 帮助我避免了论述伊比利亚文学时的一些错误。塞缪尔·P. 杰夫 (Samuel P. Jaffe) 和小威廉·A. 林格莱 (William A. Ringler, Jr.) 阅读了关于日耳曼文学的资料。林格莱教授认真审读有关英国文学的内容, 大大提高了我对英国文学论述的广度, 在阐释上也更为精确。丹尼森大学 (Denison University) 的艾米·戈登 (Amy Gordon) 和我讨论了法国文学部分 (第七章), 帮我查找材料, 为这一章的完成贡献了她的时间和学识。我的科学史专业的同事艾伦·G. 德布斯 (Allen G. Debus) 和诺埃尔·M. 斯瓦洛 (Noel M. Swerdlow) 欣然阅读关于科学的部分 (第九章), 纠正了我生物学、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方面很多非常明显的、幼稚的错误。纽贝里图书馆赫尔蒙·邓拉普·史密斯制图中心 (Hermon Dunlap Smith Cartographic Center) 的大卫·伍德沃德 (David Woodward), 对第十章进行了精确的校订, 增加了我对地理和制图发展的了解, 他还慷慨地把个人收藏的地图资料借给我。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学家、东方学家鲁多 (Ludo) 和罗赞·罗彻 (Rosanne Rocher) 仔细阅读了关于语言的部分 (第十一章), 提出意见, 修改了其中的错误, 其订正的内容已加进附录。耶鲁大学的日本文学教授埃德温·麦克莱伦 (Edwin McClellan) 帮助我解决了欧洲手稿和书籍中汉语和日语文字书写的有关问题。威斯康辛 (麦迪逊) 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的中国文学教授周策纵 (Chow Tse-tung) 不吝赐教, 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图案诗。伦敦的沃尔特·帕格尔 (Walter Pagel) 是帕拉塞尔苏斯 (Paracelsus) 研究专家, 他向我介绍了和我的论题有关的最新进展情况。

xvii

由于资料的准备和使用间隔时间太长, 我在书中没有注明有关材料的出处, 这使我深感愧疚。我要特别向哈罗德·B. 约翰逊 (Harold B. Johnson) 表示歉意, 他曾是我的研究助手, 现在是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他曾为我举办的研讨会撰写了一篇论文, 我在以前的研究中 (I, 11-19) 多有参考, 而我却没有致谢, 为此我深感歉疚。我还要向亨利·Y. K. 汤姆 (Henry Y. K. Tom) 表示迟到的感



谢，他曾是我的博士研究生，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社会科学部的编辑，他为我修订、删改了第二卷第一册的前言。最后，我还要向凯尔文学院（Calvin College）的埃德温·范·克雷（Edwin Van Kley）表示我的感谢，这一感谢早就应该表达，他欣然应允和我合作撰写这套书的后面几册，一同进行 17 世纪的研究，只是他要耐心等待我按部就班地完成 16 世纪的最后两卷，而这种等待其实是令人沮丧和痛苦的。我以前在各种场合向我的妻子阿尔玛·S. 拉赫（Alma S. Lach）表示过谢意，但语言总难表达我的感谢之万一。

像我前面提到的同仁一样，很多单位为我完成这两册书提供了诸多帮助。芝加哥大学通过它对伯纳多特·E. 施密特（Bernadotte E. Schmitt）历史教授职位的慷慨研究资助——我现在正是这一职位的教授，为我提供了聘请研究助手和打字员的费用，同时也为我这一庞大研究工程的其他费用提供资金来源。1975 年，我还从芝加哥大学社科处管理的诺曼·维特·哈里斯纪念基金会（Norman Wait Harris Memorial Foundation）申请到一笔研究经费。芝加哥大学雷根斯坦图书馆、芝加哥纽贝里图书馆和克瑞尔（Crerar）图书馆在我的研究中一直不可或缺，正是这些图书馆的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耐心周到的服务，我才得以利用其丰富的馆藏资料。书中的很多插图都是从这些图书馆复制的，我要特别感谢这些图书馆的珍本收藏部，感谢雷根斯坦图书馆珍本收藏部的负责人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和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

像以前的研究一样，我在这两册书中不揣浅陋，涉足新的领域。作为通史历史学家，我虽然有一定的阅历和涉猎，但从事这一研究，能够依仗的只有我的研究热情和奉献精神。因此，我对书里可能出现的事实与阐释中的缺失及错误深怀不安。别人的帮助已经使我将错误减少到最低，但对于书中依然存在的错误，我个人负全部责任。最后，我希望那些依然存在的错误，如果被发现的话，是可笑有趣的而非根本性的错误，尽管我的这一希望可能是枉然。

前 言

xix

欧洲人曾经欣然认为他们能够轻易地统治整个地球，但是海外探索的每一点进展都使这种认识显得异想天开。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踏入亚洲土地后就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他们谨慎地固守在缺乏安全感的据点内，避免与亚洲竞争，这一现实使得欧洲早期的探险者和冒险家对攫取东方财富所抱有的乐观主义很快转变成悲观主义。随着东方探险的深入，欧洲人逐渐认识到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伟大的大陆帝国并不像亚洲其他更为封闭的岛国那样脆弱，涉足东方土地的欧洲人因此不得不缩小自己的目标，不再试图从物质或精神上完全控制东方。这种无奈的妥协情绪慢慢地传回欧洲，但一开始并不为身在欧洲的人们所理解或接受。不过，一旦欧洲的精英阶层开始相信并接受来自亚洲的报告，他们甚至比海外探险者还深信，要尽一切可能去了解东方发达的文化，并在欧洲传统的人文背景下衡量这种新知识。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是《发现的世纪》，主要讲述欧洲人在东方的探索发现历程，描述这些探索发现在欧洲的传播情况。16世纪，欧洲人根据从亚洲带回的报告，对印度、东南亚、日本和中国有了基本的认识。在第一卷中，我通过与现代研究成果相比较，力图验证当时从亚洲传到欧洲的信息的准确性，希望能够为考察亚洲发现对欧洲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xx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是《奇迹的世纪》，包括三册。第一册为《视觉艺术》，主要对艺术品、手工艺品、动植物标本以及工艺品等“无声物品”体现出来的艺术品质进行分析。《视觉艺术》首先考察了来自亚洲的珍稀物品，比如人种学标本、矿产、艺术品、动物和植物，并把它们与欧洲的自然产品和艺术产品进行比较，然后提出这些异国情调的物品如何激发了欧洲艺术家和工匠的想象力，对欧洲艺术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通过对欧洲主流艺术和非主流艺术的全面分析，我们清楚地发现，亚洲的艺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任何一种欧洲艺术的形式，不过，对亚洲的了解促进了欧洲对亚洲艺术的模仿，丰富了欧洲装饰艺术的表现手段和设计方式。欧洲象征艺术的兴起从传统上来说归功于有着亚洲渊源的物品和设计艺术，而欧洲人不断加深的、亚洲和欧洲是一样的“现实存在”的认识，为欧洲的象征主义艺术带来了革新，加速了欧洲自然主义和风格主义^①艺术的发展。来自遥远国度的亚洲物品以及富有“聪明才智”的亚洲人，激发欧洲艺术家创作出广受欢迎的奇妙作品，丰富了欧洲艺术家的艺术想象，推动了欧洲艺术家的艺术试验。欧洲的艺术领域和思想疆域进一步拓展，吸纳了一些来自亚洲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手法。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第二册是《文学艺术》，这一册和第三册《学术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页码编排上是连续的，有着共同的前言和索引，这两册书的总参考文献和分章参考文献都放在了第三册的末尾。这种复杂的编排既不是为了故弄玄虚，也不是让读者坠入五里云雾，主要是因为这部分内容太过庞大。分册刊行只是一个技术上的措施，目的是使印刷尽可能地方便、经济。

第二卷的第二册在论述上采取的路数和第一册相同，首先梳理关于东方的信息从葡萄牙传播到欧洲其他地区的方式，包括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述。为了弄清楚有关东方发现的书籍在欧洲发行传播的数量和种类，我翻阅了60个有代表性的图书馆馆藏目录以及英国、意大利、萨克森（Saxony）和葡萄牙等国家和

① 风格主义也称矫饰主义，指16世纪出现的一种意大利艺术风格，其特点是强调比例、光线和透视的特别效果，并使用亮色，常用浓色。——译者注

地区的重要图书馆以及收藏室。在研究国别文学之前，我调查了航海大发现之前欧洲各国文学传统中对东方的记述。进入16世纪以后，有关亚洲的新信息开始渗透到欧洲各地。我的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各国固有的文学传统受亚洲新信息的影响是缓慢的，影响的程度也不相同。

在对欧洲国别文学进行论述的次序上，我依据的是其对海外发现的开放和交流程度。首先论述的是葡萄牙文学对亚洲发现的反应，接着分析了西班牙文学，因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知识上，西班牙都和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意大利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通过意大利这个主渠道，关于亚洲的材料才传播到法国和德国。在北欧，特别是16世纪上半叶，安特卫普也是传播亚洲信息的重要中心。但是，一直到16世纪末，亚洲对荷兰文学的影响都微乎其微。由于荷兰、德国和英国在地理空间上距离葡萄牙较远，因此，这几个国家的文学对亚洲发现的反应要慢得多，不过反应慢的最主要原因是宗教改革运动在北欧清教徒和南欧天主教之间所竖起的屏障。

xxi

在对欧洲各国文学的分析中，我重点依据的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作品，当然也没有排除用拉丁语撰写的重要著作。为了研究亚洲信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情况，我系统地论述了翻译活动的作用。为了分析文学文本，我对一些重要的、特别的资料采取了特殊的调查手段。在第二卷第一册中，我利用专门的图像变异技术去了解拉斐尔画作中的大象抑或丢勒画作中犀牛角的特征，并以此来追踪一件艺术品对另一件艺术品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我利用亚洲专有名词的拼写特征，基本上能够确定某些文学段落和参考文献的来源。根据我对欧洲学者撰写的亚洲著作的了解，通过研究分析那些域外的术语、名字甚或短语中语词的顺序，有时可以快速、准确地确认巴拉奥纳·德·索托（Barahona de Soto）、阿里瓦贝内或博丹等人著作中某些段落的资料来源，依据这些标记所找到的资料来源并不总是出自文学作品。阿里奥斯托、莫尔、拉伯雷和马洛等作家不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相隔遥远，他们往往根据地图来为其作品中的人物设定活动路线。历史学家和宇宙学家一般在著述中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料，因此总是毫不迟疑地既参考旧资料，也参考新信息，其著作中语词拼写上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一事实。



日耳曼文学这一章探讨了德国文学、荷兰文学和英国文学，除此以外，本书中的每一章只论述一个国家的文学。在北欧特别是在德国和荷兰，当地的文学艺术对拉丁文的依赖程度较高，与南欧相比，北欧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要逊色得多。尽管英语相对来说较少受拉丁文的影响，但是英国知名的知识分子，除了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以外，对海外发现的兴趣远没有其他欧洲大陆的同行浓厚，直到 16 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英国知识分子对海外发现漠视的局面才有所改变。北欧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其对天主教徒征服的亚洲产生敌视。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我才决定将日耳曼文学集中在一章里面进行论述。另外，我还认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为下个世纪初期日耳曼文学重要性的凸显埋下伏笔。

在第三册《学术研究》中，我重点分析了受亚洲影响最为明显的几个学科领域。关于自然科学那一章（第九章），我首先回顾了亚洲对于中世纪技术的重要性，然后简要分析了 1500 年以后亚洲走向衰落的原因。我对海外发现对航行、天文、航海的影响的分析比较简略，因此，进一步厘清、说明这些问题，还需要开展更多原创性的、专门的研究。这一章还包括对帕拉塞尔苏斯学派（Paracelsian thought）的分析，因为很多现代学者开始把亚洲看作是其思想的孕育地。受海外发现影响最大的自然科学是植物学，紧随其后的是动物学。不过，我在进行系统论述时没有涉及动物学，因为我在第二卷的第一册当中已经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讨论动物及其在欧洲艺术中的表现。

地图学和地理学是第十章论述的主题，也是世界地图打开后变化最多的学科。这两门学科由于讲求实用，越来越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因此逐渐从宇宙学和天文学中分离出去。从事地图学和地理学实践的人首先质疑先辈哲人的权威，采取一种现代的、经验的观点。他们在适应快速发展的航海发现的过程中，得到了具有共同利益的僧侣、商人、出版商的帮助，这些僧侣、商人、出版商给予他们物质上的支持，给他们提供亚洲发现的材料，意大利、荷兰以及莱茵河畔城市的出版商在推动实现 16 世纪的制图革命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大学、清教、天主教会等迫于压力，也开始承认新的地理学是其教学和图书馆的组成部分。

语言和语言学是第十一章的主题，也是学术活动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因为在海外世界发现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语言门类，但这一时期却没对这些语言进行新的科学分析，欧洲人对亚洲语言的了解还常常局限在那些没有受过语言知识训练的人，出于实用的目的记录下来的词汇。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很快成功分析了泰米尔语（Tamil）和马拉雅拉姆语（Malayālam），但是，直到 17 世纪，梵语依然是婆罗门的专利。传教士在东亚遇到的语言困境使他们努力采用拉丁语的语法体系去分析那些东方语言，尽管这样做取得了很大成功，但语言学家很快就认识到，这些用方块字书写的语言给他们带来了难以预料的挑战，他们没有办法从理论层面上去分析这些语言。16 世纪以及 16 世纪以后的一些学者对此充满好奇，进行了一些语言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17 世纪新的语言理论的发展。16 世纪在语言和语言学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欧洲语言认可、吸纳了大量来自东方语言的词汇、专名和术语。

在前面的介绍中，我多次提出对亚洲的影响进行整体研究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提出注意研究那些相关的因素。在研究 16 世纪亚洲各国的历史方面，我强调要从根本上重视欧洲资料。自始至终，我都试图指出欧洲大陆所发生的事件与对海外扩展成功与失败所持态度之间的相关性。我时时告诫自己不要犯塑造形象、追溯影响的错误，但是，我还是在创造形象，寻找影响，尽管我是百倍地谨慎。由于不满足于一般历史学家常常局限于文学资料的做法，我努力涉猎那些艺术史家、技术史家以及其他专门领域的史学家所研究的资料。我尽最大可能地向其他专家咨询并听取他们的建议，不过有的时候，我也会拒绝他们的建议，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当然，我拒绝时总是带着尊敬和审慎。尽管我肯定会有很多事实、分析和强调不当的错误，但我认为，我对 16 世纪的分析考察进一步坚定了这一观点：在现代的第一个阶段，亚洲对欧洲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xxiii

目 录

序	1
前言	5
第一部分 葡萄牙和欧洲知识界	1
引言	3
第一章 葡萄牙帝国的海外先驱	5
第一节 海外的葡萄牙学生和使节	8
第二节 葡萄牙宣传家达米奥·德·戈伊斯	16
第三节 葡萄牙的外国人、回国人员和耶稣会士	28
第二章 书籍、图书馆及阅读	51
第一节 葡萄牙和西班牙	55
第二节 意大利	61



第三节 德国	68
第四节 低地国家、法国和英国	76
附录 16 世纪关于亚洲的图书	102

第二部分 欧洲各民族文学 107

引言	109
----	-----

第三章 继承的主题 111

第一节 中古时期的典籍	112
第二节 亚历山大传奇	117
第三节 印度故事的西方流传	126
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东方故事的形式与内容	136

第四章 葡萄牙文学 154

第一节 辉煌与幻灭	155
第二节 航海事故与第乌之战	169
第三节 编年史叙事	176
第四节 史诗的综合性	187

第五章 西班牙文学 211

第一节 好奇、希望与困扰	214
第二节 传奇和诗歌中的统一帝国	227
第三节 新的历史体裁	239

第六章 意大利文学	258
第一节 传奇诗篇中的现实主义	259
第二节 流行文学与说教文学	272
第三节 历史和宇宙志	287
第四节 乔万尼·博特罗的政治思想	298
第七章 法国文学	333
第一节 亚洲的挑战	337
第二节 诗人笔下的“新世界”	353
第三节 通俗文学及说教散文中的文化相对主义	365
第四节 从宇宙志到世界通史	381
第八章 日耳曼文学	425
第一节 德国文学	427
一、初期的反应	431
二、新教和天主教在亚洲认识上的分歧	443
第二节 荷兰文学	453
第三节 英国文学	461
一、从人文主义到宇宙志	462
二、诗的艺术	471
三、戏剧与讽刺作品	478
译名对照表	516
索引	574
译后记	629



插图目录

原文页码第 252 页（本书页码第 314 页）之后

1. 曹沙法土第一次出行
2. 马可·波罗肖像
3. 明斯特《宇宙志》（1550 年）中的印度掘金蚁
4. 明斯特《宇宙志》（1550 年）中的印度“马型动物”
5. 赛弗特《宇宙学通论》（1575 年）中的女人岛
6. 皮特罗·本博的《威尼斯历史》法语改写本扉页
7. 波斯图《奇闻异事集》（1561 年）扉页
8. 波斯图《奇闻异事集》（1561 年）中的天堂鸟
9. 第乌要塞图
10. 明斯特《宇宙志》（1575 年）中的果阿
11. 塞维尔雕刻画
12. 《纽伦堡纪年史》（1493 年）中的帖木儿
13. 赛弗特《知名人物图谱和生平》（1584 年）中的帖木儿
14. 亚洲的统治者
15. 赛弗特《知名人物图谱和生平》（1584 年）中的塔普罗班纳国王曼德拉夫
16. 阿里瓦贝内《伟大的黄帝》（1597 年）的扉页
17. 皮埃尔·沙朗《智慧论》（1612 年？）中的地理决定论一览表
18. 用西班牙语记述日本使团活动的图书扉页
19. 1585 年在罗马出版的记述日本使团活动的图书扉页
20. 1585 年在迪林根出版的记述日本使团活动的图书扉页
21. 1585 年在罗马、博洛尼亚和克拉科夫出版的记述日本使团活动的图书扉页
22. 1585 年在布拉格出版的记述日本使团活动的图书扉页
23. 普坦汉姆《英国的诗歌艺术》（1589 年）中的两页图案诗